

安徽省与山西省的政府风险投资现状及建议

卞佳琪

(江南大学 商学院, 江苏 无锡 214000)

【摘要】: 本文通过对南方的安徽省(合肥市)和中部的山西省的以政府为参与主体的风险投资项目的运行情况、存在的漏洞做简要分析和对比, 根据不同省份所在地域和资源等优势的不同, 分别提出改进的建议, 促进南北充分发挥资源地域优势, 协调发展。尤其是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阴影还没有消散时, 通过以政府为主体的风险投资项目, 给有潜力的中小企业带来机遇。

【关键词】: 政府引导 风险投资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步推进, 政府参与的风险投资活动逐渐成为私募股权基金领域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政府主要通过设立政府投资基金或政府引导基金来参与风险投资活动。2020 年 6 月 9 日, 齐鲁晚报上刊登的: 合肥政府进行风险投资项目——精准支持京东方、长鑫等高新技术企业的新闻轰动一时。2019 年合肥市 GDP 达到 9409 亿元, 这是 2000 年的 30 倍, 离万亿只是临门一脚, 更是与上海、北京同为“国家科学中心城市”, 政府风险投资在其中功不可没。但是, 我国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分布是不均衡的, 风险投资资源和优势多集中在南部、东部城市, 在某些北部和中部内陆地区发展仍有一定差距。

虽然全国范围内政府引导型产业基金处于快速成长期, 但是数量和规模位于前列的是广东、山东、浙江、安徽等南部省份, 偏北部省份相比之下有些逊色, 发展动力明显不足, 所以首先通过中部的山西省与安徽合肥市的对比, 分析一下地方政府风险投资存在的问题。

1 融资渠道单一

山西省风险资本的主要来源是靠政府的财政拨款和少部分的银行贷款, 没有充分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相比较而言, 东部和南部相对发达地区融资结构基本实现多元化, 充分利用市场化机制和各类民间资本, 实现资源最优配置。

2 投资决策缺少前瞻性和冒险性

山西省等内陆省份人民思想相对保守, 冒险意识缺乏, 投资的中小企业多为早已脱离初创期的技术成熟的企业, 发展潜力和利润空间都有限, 回报率虽稳定但微薄, 投资的意义不大。而合肥市在 2007 年京东方落地合肥时就看好这个企业和它所涉足的液晶面板行业, 尽管当时京东方基本面形势不容乐观, 全球金融危机使得国外液晶巨头大幅降价, 京东方备受打击, 由盈转亏, 急需资金。2008 年落地合肥后, 在很多人都不看好的情况下, 合肥政府全力支持它的第六代面板的研究开发工作, 帮助其融资 175 亿元。到 2007 年, 京东方的投资已经超过合肥市一年的 GDP 总量。这就是敢为天下先的前瞻性和预见能力。

3 不关心投资行业前景, 而只注重基本面

一个企业的基本面的好与坏都是暂时的,在时间的检验下,都会显露出企业本身的内在价值。山西省在风险投资项目中一般选择学习、模仿其他地区或国家的技术成果加以改进,但是这种利润是微薄而且暂时的,没有自主创新,这些都会被取代,永远只能跟在别人身后捡别人已经丢掉的东西,是无止境地没有前景的未来。反观安徽合肥政府,投资的企业涉及医疗、智能制造、半导体,十几年来,制造出了“中国芯”,占领半导体国际市场。所谓前景,就是把注压在有益于中国经济加快转型升级的行业和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服务业。

4 过度依赖于传统地域资源

山西省和北方的吉林省都是资源丰富的省份。古语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但是只靠山水难免会坐吃山空。而且不完善的资本与金融市场会使得经济基础薄弱,制约实体经济的发展。煤炭、矿产资源一定是发展的助推器,但不能构成对资源完全依赖型的经济模式。合肥本身属于内陆城市,资源相对较少,但这并不影响它成功的风险投资项目。资源不是风投行业成功的必要条件,如何高效地、有节制地利用资源,并抓住以资源为本钱带来的机遇,发展更高层次的技术或行业,这是关键。

5 配套金融政策缺位,政策环境没有明显优势

所有问题解决的源头和根本都在于制度与政策,政府风险投资也不例外。山西省政府在支持中小企业、帮助其融资、拓宽融资渠道等方面都没有具体的实实在在或是效用很大的政策导向。所以在“募、投、管、退”的每一个环节中,都有一定程度的缺位。“退”这个环节主要依靠上市,但是由于上市公司缺乏,已经严重影响了风投退出的通畅性。管理、考核制度同样也是急需完善和明确的体制机制。

既然中部地区的政府的风险投资存在着诸多问题,那具体应该如何改进呢?在这里,本文提出几点建议:

(1)从制度法律入手:这是根源上的保证。不断完善政府投资基金体系,完善基金的运作机制,加强法律上的监管,并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持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行业等关键技术行业的发展,主动契合“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和“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导向。

(2)从氛围上:在思想过于保守的地区,鼓励人们进行创新与适当的冒险,可以通过政府的有限托底来刺激投资,为经济增添活力,还可以运用适当的资金动员机制。如美国的SBIC(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就是在已经融资达到1500万美元中小企业进行股权或债权融资,可以提供其原本融资金额的2-3倍低息配套贷款,因此迎来了美国小企业投资公司的蓬勃发展。我国也可以适当增加杠杆率来动员并帮助有潜力的中小企业筹集更多的资金。

(3)从投资项目本身选择上:选择发展潜力大的行业和技术,具有一定前瞻性和预见性,重点发展关键行业关键技术,让中国制造成为世界的骄傲。

当前的政府风险投资行业同时面临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地区发展仍然存在一定差距,这就需要相对落后地区积极转变,迎头赶上,与发展较快的地区齐头并进,做好并做强中国政府风险投资品牌。

参考文献:

[1]赵鑫.美国、日本发展政府投资基金支持科技创新的经验及启示[J].经济研究导刊,2020,(7):165-166.

[2]纪玲珑,王演.山西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路径选择:政府引导风险投资[J].晋中学院学报,2014,(5):48-50.

[3]李娜. 山西省政府引导性风险投资发展问题研究[J]. 当代会计, 2014, (12):57-59.

[4]王海龙, 朱杰, 张昕婧, 等. 政府引导型产业投资基金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 科技中国, 2019, (6):60-63.

[5]刘捍东. 做强政府投资基金品牌助力江苏加快转型升级[J]. 中国财政, 2016, (24):28-30.